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與研究）

參與義大利全球新興學者計畫

服務機關：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姓名職稱：陳至潔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德國、法國、義大利

出國期間：100年6月17日至30日

報告日期：100年7月14日

國立政治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出國成果報告書

計畫編號 ¹	100H114-02	執行單位 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出國人員	陳至潔助理研究員	出國日期	100 年 6 月 17 日至 100 年 6 月 30 日，共 14 日
出國地點 ³	義大利杜林世界事務研究中心主辦的全球新興學者訪問計畫以及杜林世界事務研究中心與杜林大學政治系合辦的歐洲夏日中國政治經濟研究課程	出國經費 ⁴	新臺幣 81,966 元
摘要			
<p>本人代表國立政治大學，在民國 100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30 日參加由義大利杜林世界事務研究中心（Turin World Affairs Institute, T.Wai）主辦的全球新興學者訪問計畫（Global Emerging Voices Fellowship Program, GEV），以及 T.Wai 與杜林大學政治系合辦的歐洲夏日中國政治經濟研究課程（TOChina）。本次活動部分資金由政大頂尖大學計畫贊助。</p> <p>T.Wai 副主任，也是杜林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的 Giovanni Andornino 自民國 99 年 11 月開始與本人聯繫，希望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建立長期研究合作關係。經過謹慎評估與多次校內討論後，本人認為有必要實地到歐洲參加一次，以考察評估是否有長期參與該二項計畫的價值。在參加完 GEV 計畫全程與部分 TOChina 計畫之後，本人認為 GEV 計畫與 TOChina 計畫對台灣中國研究社群有重要的價值，值得持續參與並支持杜林大學的努力。但是由於該二項計畫的目標和參與方式有明顯的區別，本人建議由不同的資金來源予以支持。以下是實地考察的報告內容。</p>			

¹ 單位出國案如有 1 案以上，計畫編號請以頂大計畫辦公室核給之單位計畫編號 + 「-XX（單位自編 2 位出國案序號）」型式為之。如僅有 1 案，則以頂大計畫單位編號為之即可。

² 執行單位係指頂大計畫單位編號對應之單位。

³ 出國地點請寫前往之國家之大學、機關組織或會議名稱。

⁴ 出國經費指的是實際核銷金額，單位以元計。

目的：計畫緣起

GEV 計畫參與者為來自亞太區域與歐盟的 9 名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與專業人士，平均年齡為 29 歲。而 TOChina 計畫的參與者則為亞太地區與歐盟研究中國事務的 20 位碩士與博士生，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全球總共有 87 人申請參與）。這是 GEV 計畫第一次付諸實施，而 TOChina 計畫則已舉辦四年，在歐洲中國研究學術界已建立不錯的口碑。GEV 計畫的構想在 2009 年由 Giovanni Andornino 以及另一位杜林大學政治系研究東亞政治經濟的副教授 Giuseppe 提出，他們希望藉由促進歐盟政策界與亞太區域中國研究學術社群的交流對話，進一步了解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為歐盟找尋影響亞太區域（特別是中國）發展的路徑，同時提升中國研究在歐盟決策界的整體地位。他們的構想獲得杜林銀行家們的認同與贊助，遂有今次計畫的實施。

Andornino 教授與 T.Wai 對台灣相當友好，他認為沒有台灣參與的歐亞學術對話是不夠、也是不應該的。在他的堅持下，台灣不只能夠以完全平等且具尊嚴的身分與待遇參與計畫，中華民國國旗也與其他參與國家國旗並列於計畫手冊與網站宣傳資料上。值得注意的是，隸屬於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也派出該單位歐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黃靜參與 GEV 計畫。據她表示，現代國關所主管對 T.Wai 將中華民國國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並列於計畫手冊及網站表示不悅，但從未要求她退出 GEV 計畫，或指示她做出任何抗議舉動以及杯葛台灣學者參與的舉動。本人不知中國大陸政府與智庫是因何理由未提抗議，但這的確與以往頗有不同，也為兩岸以對等方式共存於歐洲中國研究社群立下基礎。僅憑這一點就足以顯示 GEV 計畫對台灣歐盟研究與中國研究社群的重要性：就本人所知，GEV 計畫是目前為止唯一允許台灣以完全平等於中國大陸代表的身分與方式參與歐盟學術界關於中國研究的多邊對話機制，其他現存的學術對話都是台歐雙邊，而未包括其他國家，遑論中國大陸。可以說，GEV 計畫是台灣參與歐盟中國研究多邊學術網路的橋頭堡。本人在訪問德國外交部、法國外交部、歐盟官方安全智庫時沒有受到任何低於其他學者的待遇。兩岸共存於歐盟中國研究社群對話網路的現象值得繼續觀察，也值得台灣持續參與。

過程：行程簡介

GEV 計畫的第一站是德國柏林（6 月 19 日至 6 月 22 日），由德國密卡托基金會（Stiftung Mercator）協助安排會見德國外交界、學術界、與文化界的中國事務專家。密卡托基金會為近年迅速崛起於德國政壇的民間智庫，其行政主管與研究人員相對年輕，主要關心非傳統安全與跨國社會議題，包括氣候變遷、新能源開發、食品安全、全球人口移動、以及教育品質。密卡托基金會自 2005 年開始關心中國發展對歐盟與全球的影響，並與中國智庫及政府展開交流。密卡托基金會與德國官方的歌德學苑及中國國家博物館合作，以四年的時間籌備一項大型的德國啟蒙時代藝術品展覽活動，在今年 4 月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整修後重新開館的第一個展覽項目。

因為這層關係，密卡托基金會得以進入中德雙邊關係的網路中，並邀請多位重量級的德國/歐盟學者與官員與 GEV 學員對話，包括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文化與傳播媒體管理學院院長 Klaus Siebenhaar、歐洲外交事務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資深政策研究員 Jonas Parello-Plesner、德國全球公共政策中心（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兼副主任 Thorsten Benner、德國外交事務協會（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GCFR）主任 Eberhard Sandschneider、德國聯邦外交部文化事務特使 Heinrich Kreft、密卡托基金會柏林分部主任 Andre Wilkens、著名小說家與文學評論家 Tilman Spengler、歐洲氣候變遷研究基金會（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研究員 Markus Steinberger 等等。GEV 學者在 6 月 21 日下午進行了 6 個小時的模擬談判，主題是聯合國氣候變遷架構條約下 2012-2020 年全球碳排放與新興能源應用的多邊協商。

GEV 的第二站來到法國巴黎（6 月 22 日至 6 月 26 日），由附屬於法國社會科學學院（SciencesPo）的亞洲研究中心（Asia Centre）協助會見法國/歐盟外交界與研究中國之智庫學者。由於巴黎與歐盟執委會及部長會議所在地布魯塞爾不遠，亞洲研究中心便邀請多位歐盟執委會外交與經貿官員至巴黎與 GEV 學者會面，地點便選在位於巴黎市中心的歐盟安全研究中心（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與會的歐盟官員與學者包括負責歐盟對大中華地區外交關係的 Francesco Meggiolaro、歐盟對外貿易委員會處長 Antonio Parenti、歐盟經濟與金融事務委員會處長 Valerie Rouxel-Laxton、歐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 Nicola Casarini 等人。另外，亞洲研究中心也安排 GEV 學者與法國外交部東亞部門及國際組織部門官員會談，包括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全球化政策規劃處處長、開發中國家關係司司長等資深職業外交官。GEV 學員並在 6 月 25 日舉行長達 10 小時的歐中關係狀況模擬演練（scenario building exercise），由長期參與全球能源產業危機處理的談判專家 Alexander Van De Putte 全程視導。

在巴黎行程結束後，部分 GEV 學員（包括本人在內）隨同義大利杜林學者抵達杜林大學政治系參與歐洲夏日中國政治經濟課程（TOChina）的實施。本屆 TOChina 課程係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系著名中國政治學者 Richard Baum 與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中國經濟史教授 Kent Deng 共同主持，並邀請其他歐洲中國研究學者（例如 Kerry Brown）與部分 GEV 學者發表專題演說。本人在 6 月 29 日返國。

心得

歐盟的中國焦慮症

我們可以將 GEV 計畫的誕生視為歐盟中國焦慮症（The China anxiety syndrome）的體現：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及其在歐盟區域迅速擴張的影響力，西歐學者擔心歐洲不再如以往那樣影響中國的社會思想與政治經濟制度，歐洲與中國的權力關係將要改寫甚至翻轉，而且歐盟在全球政經發展的分量可能因為中國崛起而顯得無關緊要。西歐學者的中國焦慮症候群在 GEV 計畫的行程中展露無

遺。

一、 文化層面的中國焦慮症

歐盟學者的中國焦慮症最明顯地出現在文藝界人士，特別是那些親身實地長期與中國政府交流的文化界人士。傳統的看法-或期待-認為交流會帶來理解與友誼，降低緊張與對立，進而改善雙邊關係，而文化與教育交流較不具政治針對性，因此也被視為具有潛移默化、改變對方基本觀念的長期作用，也是一個社會發揮其軟實力的主要管道。但是中歐-特別是中德-多年文化交流的結果，卻是因為更加明瞭對方那些不能改變的基本立場而更加失望與挫折。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文化與傳播媒體管理學院院長 Klaus Siebenhaar 是德國文化與傳播學界重量級的學者，他與中國文化界交往的例子在德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Siebenhaar 教授有極為豐富的文化事務管理經驗，已過數年在德國政府歌德學苑的邀請下，連續擔任數期中德文化管理專業人員高級培訓班的教授，並實地參與中德藝術文物交流項目。Siebenhaar 教授對中國與德國政府在文化與藝術事務管理邏輯與管理方式的異同之處有第一手的觀察，在他的演說中明確提到，中國政府與共黨宣傳部門對文藝界的管制與歐洲社會的自由主義基礎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差距：中方宣傳部門管理文化活動的幹部要求他，只教管理手段就好，但是對 Siebenhaar 教授而言，永遠都是文化先行，而後才有文化活動的安排與協調。並且，中方文化部門管理者一直認為文化產業不過是另一種以營利賺錢為主要核心目的的產業，但是對德國文化界人士而言，文藝指涉的是高等文化（High culture），與文創產業有明顯的分際，是絕不能混淆的。他的切身體驗告訴他，在中國，文藝先是臣服於政治，繼而臣服於經濟，本身沒太多獨立的地位，這一切都與戰後德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即尊重高等文化的獨立性--背道而馳。他無法說服中方，而中方雖然繼續邀請他回到中國授課與交流，也對他持續就這些基本問題提出異議而感到困擾。可以說，中德文化界人士因為接觸而了解對方，也因為接觸而發現無法跨越的結構性挫折感。

中德雙方對彼此的挫折感在今年 4 月達告高峰，因為中國一方面與德國政府合作展出啓蒙時代的德國藝術品，卻在同時展開自六四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內部整肅，甚至以隱諱的經濟罪名與道德藉口逮捕著名藝術家艾未未。艾在德國享有很高的名氣，他的被捕失蹤引發德國文化界對中國政府的嚴厲批評，甚至開始質疑此項啓蒙時代文物展覽的合法性：一個以自由主義為社會基礎的德國怎能忍受一個宣稱要推廣啓蒙思想、卻在同時鎮壓言論與表達自由的政權？德國政府與文化界怎能贊助這種為獨裁者誦讚歌的交流活動？在啓蒙中國社會思想與忍受中國政府作為之間，到底有沒有平衡點？Siebenhaar 教授沒有確定的結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他自己對中德文化交流的熱情已然耗盡，他決定不再參與這種沒有實際影響的文化交流，可是在同時他也承認德國文化與文化活動管理制度對中國的吸引力正在減少，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中國文化活動管理單位開始認為歐洲已不再是中國應該效法模仿的對象了。

德國著名的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與漢學家 Tilman Spengler 也表達十分相似的挫折感與無力感。Spengler 受密卡托基金會及歌德學苑委託，擔任中德啓蒙時代文藝作品交流計畫的德方策展人，至終卻在展覽開始前夕被中國政府拒發簽

證、拒絕入境，因而無法參加開幕儀式，因為他公開批評中國政府逮捕藝術家與維權人士，特別是艾未未。這起事件並未讓他減少對中華文化與對中國社會的熱愛，但的確促使他重新發現那些隱含在中德/中歐文化交流底下的政治性質，以及德國學術界與中國同行交流的所受到無所不在的思想限制。

二、經貿層面的中國焦慮症

歐盟學者的中國焦慮症也反映在經貿與金融議題上。歐洲外交事務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資深政策研究員 Jonas Parello-Plesner 在 6 月 20 日針對中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的政策與其對歐洲聯盟的意涵發表演講。Jonas Parello-Plesner 在加入 ECFR 之前，是丹麥的職業外交官，長期擔任與中國事務相關的職務，包括派駐到丹麥駐中國大使館，以及丹麥外交部中國與東北亞事務資深顧問。他全程參與了丹麥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談判，也是丹麥政府中國戰略白皮書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並同時擔任丹麥政府派駐到歐盟部長會議的亞洲事務首席官員。Parello-Plesner 在 2008 年 12 月曾經訪問台灣，對台海局勢與兩岸交流很感興趣。

他的演講由三個實際的議題領域來看中國在金融危機的當下對歐盟的經濟影響，這三個議題領域包括了中國購買個別歐盟國家政府公債，中國公司-特別是大的國營企業以及那些與黨國體制關係密切的重要企業-在歐盟的投資，以及中國公司參與歐盟基礎建設的程度。Parello-Plesner 認為中國公司在歐盟的投資與中國政府鼓勵企業走出去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現在中國對歐盟區域的公債持有數額及其投資項目都不甚透明，這當然令歐盟的決策者感到擔憂。並且目前歐元區的經濟情形極不樂觀，中國增加持有南歐諸國-包括希臘、西班牙、與葡萄牙等-政府公債的舉動是否會由單純的投資轉變為具有政治意涵的援助，甚而演變成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畫，將是歐盟執委會以及公共政策研究界關切的重點。Parello-Plesner 回答 GEV 學者的問題時表示，他個人綜合各方情報分析，並不認為中國政府會在現階段或近期內以購買或釋出歐盟政府公債為手段影響歐盟決策，因為這樣做可能導致歐元區的崩潰、以及歐盟區域的社會暴動，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與企業利益。然而中國政府將手上持有歐盟國家公債的數額與價值視為國家機密的作法，是陷歐盟全體與個別歐盟國家政府於完全被動局面，無助於中歐之間的互信，而日益緊密互賴的中歐經貿關係卻建築在彼此防備的重商主義結構之上，對雙邊長期關係只能說有害無益。歐盟學者的中國焦慮在 Parello-Plesner 的演說中展現出來：中國政府不透明的經濟行為讓歐盟決策者擔心，但歐盟又沒有合適的政策工具去迫使或誘導中國政府對歐投資的透明度與規範性，只能被動等待並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

德國全球公共政策中心（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兼副主任 Thorsten Benner 的演講主題是中國與歐盟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關係。Benner 是德國國關智庫界長期鑽研全球治理與多邊組織改革的學者，他由全球治理的視角研究中國崛起對歐盟與國際組織的意涵。他首先認為全球地緣政治的平衡已因中國崛起而遭到裂解，新的平衡仍在形成，但是現有的國際組織卻無法及時在組織與決策結構上反映這種明顯的變化，組織與現實的差異正在逐日擴大。由此開始 Benner 提出了五個缺乏（Five lacks），來描述歐盟的中國政策：第一，歐盟缺乏一套具有整體連貫性的中國政策（lack of coherence）：歐盟的中國政策更像是 27

個國家與中國的 27 個雙邊關係，而非歐盟作為一個政治單位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這使中國能夠將歐盟國家分而治之。第二，歐盟的中國政策缺乏優先順序（lack of priority）：那些會影響中歐長期關係的結構性問題常被突發的短期狀況所掩蓋，而歐盟成員國的民主政體導致政治人物必須不斷應付這些突發問題而忽略了長期戰略性的議題。第三，歐盟的中國政策缺乏勇氣（lack of courage）：歐盟成員國對中國的崛起充滿畏懼與不確定的感覺，但政治人物很少談到要如何改變中國或引導中國崛起的過程。第四，歐盟的中國政策缺乏願景（lack of vision）：歐盟決策者只想到今日與明日，而沒有意願與精神去規劃五年與十年後的中歐關係。第五，歐盟與中國缺乏真正的互信（lack of trust）：由於政治體制及執政者意識形態差異過大，歐盟成員國與中國領導人對彼此的政策總是懷疑在先，然後才是謹慎交往。在演講的最後，Benner 認為中國自己也仍在適應突然暴增的國際實力與影響力，而中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都還未顯示出對全球治理的責任感，以及對分擔全球治理成本的承諾。簡言之，重商主義與狹隘的國家利益仍舊繼續指導著中國的全球治理政策。這樣的思想充分反映在中國的氣候變遷、全球金融體制改革、新能源開發、全球人權建制、以及防核擴散政策上。

三、政治與安全層面的中國焦慮症

事實上，最能顯現歐盟中國焦慮症的是在政治與安全議題。德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研究部主任 Eberhard Sandschneider 是德國學術界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的演講也最令人震驚，因為他主張歐盟國家必須體會，對中國政府眼中，歐洲（尤其是西歐）早已不再是最好的典範（a supreme example）了，歐洲的沒落早已開始，這樣的體會不過是跟上現實。Sandschneider 強調歐洲必須從現在就開始進行他所謂的成功且優雅的沒落（successful & graceful decline）：歐盟的菁英階層必須承認中國的崛起，承認中國在國際政治與安全議題的影響力早已超越歐洲，甚至要承認中國某些政治制度的優越性，進而向中國學習。Sandschneider 認為歐洲政經菁英從未正視中國，從未想要認真地認識中國，對中國只有懷疑、鄙視、與無知。歐洲必須揚棄這些態度，重新全面地認識中國，並向中國學習它成功推動結構性改革的秘訣。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不若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中國花了许多力氣在理解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上，而歐洲對中國的了解至少要達到中國對西方的了解程度。並且，Sandschneider 指出不只歐盟內部缺乏具連貫性與前瞻性的中國政策，目前為止也不見大西洋兩岸的歐美國家在各自的中國政策達成共識。簡言之，歐洲一定要清楚地認識，這是一個多極的世界格局，歐洲最多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成員，歐盟必須給與中國充分的認可，並停止無用的指控與那些不請自來的指導。

多極世界中的歐盟中國政策：挫折中的務實

與學者的挫折感與失落感相比，歐盟與德法兩國官員對中國的態度較為平衡，也較為務實。歐盟領導階層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便十分重視與中國的全面關係，也希望提升歐盟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但是中歐關係不只是雙邊關係，也牽涉到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特別是美國。歐盟與中國每年固定舉行多個高層與事務層級的對話，包括一年兩次的人權對話。歐盟與中國在諸多全球治理的議題領域裡有重疊的利益，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價值與政治意識形態上仍然存在深

層的分歧，也因此多位歐盟官員都表示要務實的處理中歐關係，不要對中國的政治改變存有太多的幻想，也不要過度堅持那些在歐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價值。以人權議題為例，歐盟官員對中歐人權對話缺乏實質效果雖表失望，但並未打算停止該項對話，因為歐盟至少能夠藉由制度化的溝通管道向中國政府表達與人權有關的議題。運用體制內的對話較能顧及中方的感受，也較可能在關鍵時刻發揮積極的效用，例如爭取提早釋放某些遭監禁的政治異議人士或維權人士。

歐盟官員及德法兩國外交官員大致認為歐洲仍然可以影響中國的外交與內政，即便這樣的影響力正因為歐盟內部許多問題而刻正削減中。根據官員的說法，歐盟對中國的實質影響力分為兩種類型。首先，歐盟決策者手中仍握有一些中國政府與企業一直想得到的特許權利（例如中國在歐盟的市場經濟身分，即 Market economy status, EMS）與貿易物件（例如武器禁運與雙重用途科技產品管制），歐盟可以這些權利或物件為談判籌碼，要求中國在特定的議題領域中做出有利於全球治理的讓步或政策改變。然而歐盟官員也指出，時間並不站在歐洲這一邊：歐盟若是因為美國的壓力而繼續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與雙重用途科技產品管制，中國便會自行研發所需武器，或轉而向非歐盟國家（例如俄羅斯）採購，歐盟至終可能因此失去大筆商機。而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規定，中國將在 2016 年自動取得市場經濟身分，屆時歐盟無論如何都必須接受。所以，歐盟只有不到五年的時間能夠運用這個經貿籌碼。為了善加運用籌碼，歐盟官員私下表示正在研擬將這些籌碼與某些敏感議題掛鉤，例如歐盟有可能將解除武器禁運與中國改善人權狀況掛鉤，但前提是美國政府針對此項政策的默許。

其次，歐洲外交官員（特別是法國外交部官員）認為中國與歐盟在許多議題上具有重疊的利益以及相似的談判方式。與美國相比較，歐洲政府較為習慣多邊外交協商而非片面行動。歐洲處理對外關係的主流方式與中國政府歷來追求的所謂國際政治民主化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尊重並且盡量納入不同的意見。準此，中國與歐盟應該能夠在大部分的全球治理議題上找出共同立場。法國外交部主管開發中國家與 G20 組織的職業外交官均承認，他們正面臨一個比以往更堅持自己立場（assertive）的中國政府，不論是在全球金融制度改革或是解除武器禁運的議題上，中國政府的立場都是日趨強硬。但是與美國官員不同的是，法國外交官認為中國有權利從事國防武器現代化，而一個迅速崛起的新興強權也很難不與現有大國產生碰撞與摩擦。法國外交部官員認為中國現在的外交方向與十年前沒有甚麼太明顯的不同，差異之處只是在聲音的大小而已。他們希望歐盟成員國（尤其是英法德義等領導國家）必須認清時局，同意挪出更多的國際地位給中國，但在同時也要致力尋求制定一套中國也會同意的國際體系共同規範（a set of common rules）。承認並充分尊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決策過程的權利便成為中歐關係未來發展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歐盟仍然能夠形塑中國的全球治理政策，因為沒有責任與監督的權利將不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尊重。

準此，歐盟國家便可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全球治理的責任，提供更多全球公共財，吸收更多全球治理的成本，以及扮演全球治理機制維護者的角色。例如，中國雖然對非洲國家提供大量且多種的經濟援助，但仍未與其他主要外援提供國（主要是已開發國家）就援助非洲事宜交換資訊與進行制度性的多邊協商。中國不參加對非援助多邊協調機制的主要原因，除了與已開發國家不一致的援助政策以外，也因為中國擔心非洲受援國會將中國視為另外一個殖民主義國家。但是法

國官員也指出，一旦中國加入對非援助多邊協調體制的對話中，中國援助非洲的金額與用途也必須更爲透明，換句話說，加入多邊機制的權力必須與隨之而來的國際期待與責任成正比，否則中國的國際形象勢必受到損害。國際問責與外交政策透明度將是中國多邊外交的主要挑戰，也是歐盟與歐洲國家能夠改變中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要方式。

政策建議

根據本次參與全球新興學者訪問計畫的豐碩成果，本人有以下數點未來政策上的建議：

- 一、 鑒於杜林世界事務研究中心與杜林大學政治系對台灣的友好態度，以及豐富紮實的訪問交流行程，本人強烈建議政府單位持續贊助本計畫，用以增進台灣政府與學術界對歐盟中國政策的了解、加強台灣議題在歐盟官方與學術界的能見度、以及協助台灣政府與學術界打入在歐洲的中國研究學術網路。本人建議可由外交部亞太司或歐洲司提供旅費的協助。杜林世界事務研究中心副主任向本人透露，明年他們除了柏林與巴黎之外，還將安排至少兩天的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行程，而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總部也可能列入行程當中。台灣切不可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本計畫與政大國關中心長年執行的台歐會並不重疊，而且兩項計畫具有互補性：台歐會屬雙邊智庫學術交流性質，而杜林計畫則是多邊政府學者交流性質。
- 二、 台灣應該加強對歐洲的文化外交工作。當歐洲學者因爲頻繁交流而對中國產生挫折感之際，正是台灣推銷自己軟實力的絕佳時機。多位德國演講者在交流結束後，都對本人與其他 GEV 學者表達他們對台灣政治轉型與文化底蘊的肯定。
- 三、 台灣應該加強對 G20 組織的瞭解，並研究與 G20 產生制度性聯繫的方式與管道。法國爲現任 G20 的輪值主席，根據法國外交部主管 G20 的官員表示，G20 輪值主席有權邀請非 G20 的國家或多邊經貿組織參與 G20 的各種會談，而受邀國（invitees）雖有發言權，但無投票權。鑒於中國因素的存在，台灣極難在短期內正式加入 G20，但我國的全球經貿實力就是政府爭取制度性聯繫的最佳籌碼。新加坡雖不是 G20 的正式成員國，但在法國的邀請下，該國也已被納入 G20 的部長級會議之中，台灣似可循此例進入 G20 的體制中，畢竟 G20 的未來對台灣極爲重要。

建議事項參採情形 ⁵	出國人建議		單位主管覆核		
	建議採行	建議研議	同意立即採行	納入研議	不採行
1. 政府單位持續贊助本計畫，建議可由外交部亞太司或歐洲司提供旅費的協助。	V				
2. 台灣應該加強對歐洲的文化外交工作。	V				
3. 台灣應該加強對 G20 組織的瞭解，並研究與 G20 產生制度性聯繫的方式與管道。	V				

出國人簽名：陳至潔 

連絡人：陳亦佳

日期：100年8月3日
分機：77290

⁵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者，此欄位可不必填寫。